责编 张 波 曲文亮 程晓云 E-mail:tyrbszbb@126.com 太原日报

红色记忆

从地方武装到王牌劲旅

红山

抗战胜利后，阎锡山依托山西“表里山河”的地形构建碉堡防线，企图长期盘踞。中共中央以晋绥、太行、太岳三大战略区为框架，确立山西地方武装“由下至上、梯次升级”的建军思路。从县为单位的独立营、县大队，到整合而成的军分区基干团，再到升级组建的军区独立旅，最后整编入野战军，山西地方武装走出了一条“分区防御、机动歼敌”的特色道路。这些被称作“土八路”的武装力量，虽装备简陋，却扎根三晋大地，成为巩固解放区、阻击国民党的中坚力量，为上党、吕梁等关键战役筑牢了基础。

三大战略区的地方武装，各守一方、协同作战，在三晋大地掀起了反攻浪潮，各展其能，打出了赫赫威名。

晋绥军区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，以吕梁军区为核心的武装力量，一边阻击阎锡山军西犯，保卫延安东大门，一边不断向野战军输送主力——独立第4旅（经过纵队隶属和番号变化，1949年整编为西北野战军第2军第4师）跟着彭德怀横扫大西北；雁门、绥蒙军区则在晋北、塞外展开游击，牵制阎、傅联军的大量兵力，切断其交通要道。

太行军区作为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大门，是上党战役的主力支撑，1945年直接以地方武装为重要兵力，一举歼灭阎锡山部3.5万余人，是解放战争的首场大规模歼灭战；1947年组建的独立旅，更是成为机动突击力量，跟着晋冀鲁豫野战军南征北战。

太岳军区则是晋南作战的核心力量，其组建的第23旅堪称“草根王牌”，这支由地方基干团整合而成的部队，在临汾战役中以坑道爆破创造攻城奇迹，被徐向前亲自授予“临汾旅”荣誉称号，后改编为华北军区第60军179师，从山西一路征战到大西北、大西南。

随着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，山西地方武装的整合迎来顶峰。1948年晋中战役大获全胜后，解放军完成对太原的战略包围，为攻克这座“碉堡城”，中央成立晋中军区，成为解放太原的专属核心力量。

晋中军区不仅抽调精锐负责太原南北的攻坚阻击，更依托各军分区保障战场后勤、补充兵员、清扫外围据点，既当“攻坚尖刀”，又做“后勤后盾”。数十万地方武装指战员与华北军区18、19、20兵团紧密配合，用血肉之躯撕开阎锡山的最后防线，为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1949年5月，大同和平解放，山西全境宣告解放，山西地方武装也迎来了历史使命的新起点。9月1日，山西军区（后称山西省军区）正式成立，由原晋中军区及太行、太岳军区各一部合并组成，标志着山西地方武装彻底完成从游击武装到正规国防力量的转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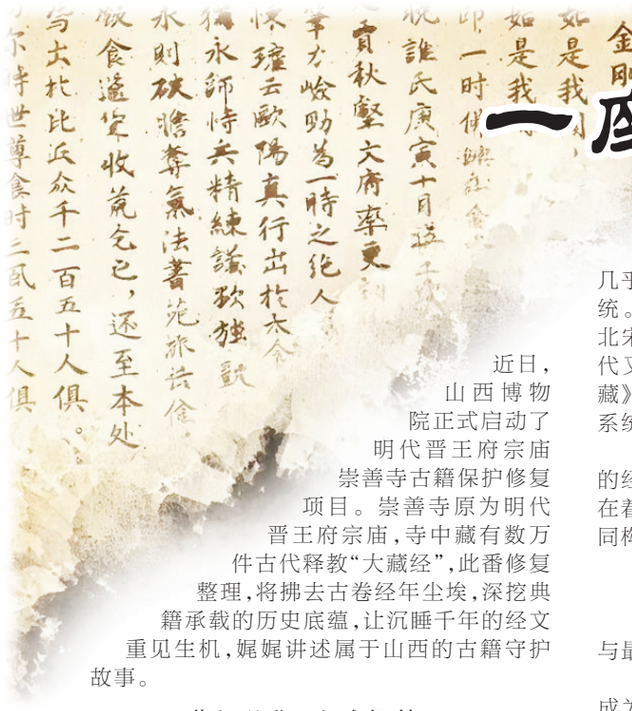
这支从三晋大地上成长起来的武装力量，用四年时间书写了强军传奇：累计向一野、二野、华北军区兵团输送数十万兵员，整建制升级数十个主力团、旅，孕育出“临汾旅”等英雄部队，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而山西省军区的成立，让这些征战四方的三晋子弟兵，转身成为巩固新生政权、开展剿匪肃特、建设国防的中坚力量，继续守护着这片他们用鲜血解放的土地。

解放战争时期的山西地方武装，不仅完成了自身从分散到集中、从游击到正规的发展转变，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力量。他们是扎根乡土的守护者，是冲锋陷阵的战斗者，更是野战军的“兵源宝库”，为华北、西北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那些从县大队走出的指战员，用土枪打出了王牌风采，用血肉之躯铸就了胜利丰碑。他们的故事，不仅是一部人民军队的建制转型史，更是一部山西人民与子弟兵同心同德、并肩作战的奉献史。硝烟散尽，精神永存，三晋大地的铁血荣光，终将永远镌刻在历史长河中。

一座崇善寺 半部藏经史

王 进



近日，山西博物院正式启动了明代晋王府宗庙崇善寺古籍保护修复项目。崇善寺原为明代晋王府宗庙，寺中藏有数万件古代释教“大藏经”，此番修复整理，将拂去古卷经年尘埃，深挖典籍承载的历史底蕴，让沉睡千年的经文重见生机，娓娓讲述属于山西的古籍守护故事。

藏经总集 文脉根基

很多人误以为大藏经是一本佛经。实际上，大藏经并非一本书，而是一部大型佛教典籍总集。通常，一部大藏经要汇集上千部历代翻译、整理和编纂的佛教文献，规模之大，文字之多，可称为古代世界庞大的典籍工程之一。它既保存了丰富的哲学、文学、语言、艺术和中外文化交流资料，也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版本学、目录学、雕版印刷的高超水准。因此，大藏经不仅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，也不啻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“盛世修文”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文化传统。中国历代王朝大多有修前朝史的制度传统，以存史资政、鉴往知来。每当国家统一、社会稳定、文化繁荣之际，整理史籍、纂修史书便被提上日程；有唐以降，历朝历代也都形成了不断校勘、刊刻、续修大藏经的文化传统，诚然其中有祈福避祸的宗教心理，但也在客观上保存了典籍、延续了文脉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正史编纂和大藏经刊刻都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文化工程，前者记录历史，后者保存文化，它们共同见证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、兼收并蓄的发展进程。

明帝求法、白马驮经，一部部释教典籍随之传入中国。随着佛教在中国近千年的发展，典籍数量不断增加，依靠单纯的人工抄写已经难以满足传播和保存的需求了。雕版印刷技术成熟后，刊刻大藏经便成为顺理成章的发展。北宋开宝年间，宋太祖赵匡胤下令在成都雕刻我国第一部木刻大藏经《开宝藏》，历时十余年，雕版多达13万块，成为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。《开宝藏》不仅奠定了后世刻本大藏经的基本格局，还传播至朝鲜半岛、日本等地，对东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被发现于山西洪洞广胜寺的《赵城金藏》即脱胎于《开宝藏》，学术界也称此脉络下的大藏经为“中原系”大藏经。

遗憾的是，《开宝藏》的经版后来毁于战火，原刻本几乎失传。但自此以后，刊刻大藏经成为了一种文化传统。辽代有《契丹藏》，学界称之为“北方系”大藏经。北宋末南宋初有《崇宁藏》《毗卢藏》《思溪藏》，南宋、元代又有《碛砂藏》《普宁藏》，明代则相继刊刻《洪武南藏》《永乐南藏》《永乐北藏》等官版藏经，学术界称这一系统下的刊刻佛典为“南方系”大藏经。

三个系统的大藏经，既继承前代成果，又不断补充新的经典、修正文字讹误、改进版式装帧，各体系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的情况。这样一次次的刊刻，勾连起来，共同构成了中国刻本大藏经丰富而庞杂的发展脉络。

千年刊刻 一寺荟藏

崇善寺藏经，正是大藏经发展脉络最珍贵的见证者与最重要的保存者。

崇善寺始建于隋唐之际，明代由晋恭王朱棡重建，成为晋王府宗庙。历经数百年变迁，寺院现存数万卷宋、元、明历代佛教经典，其中包括北宋《崇宁藏》、南宋《碛砂藏》、元代《普宁藏》、明代《永乐南藏》《永乐北藏》等重要版本。跨越宋、元、明多个时代的重要刻本能够集中保存于一寺，在海内外都十分罕见。从各种意义上，我们都可以感叹一句——一座崇善寺，半部藏经史。

《崇宁藏》是宋代最重要的民间刻本大藏经之一。它始刻于北宋元丰三年（1080），历经30余年方告完成，后又在南宋时期补刻修订。因南宋未曾开刻官方藏经，故若有官方许可的新入藏经典，都交由《崇宁藏》刊出，所以此藏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作南宋的官藏。但由于年代久远，加之战乱流散，原刻本今天已极少存世，故而崇善寺保存的《崇宁藏》弥足珍贵，对于我们研究北宋雕版印刷技术、佛教文献和版本演变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
此外，崇善寺保存着的《碛砂藏》也堪称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传奇。这部大藏经始刻于南宋嘉定九年（1216），直到元代才最终完成，其后在明代仍不断补刻印行，前后历时200余年，跨越宋、元、明三个朝代。一部书历经数代人接力完成，在中国古籍史上极为少见。《碛砂藏》不仅新增了不少经典，其版式和编排还直接影响了后来明代《洪武南藏》《永乐南藏》等官版藏经，因此被视为中国刻本大藏经承前启后的重要版本。因为崇善寺保存的《碛砂藏》刊印时间早，也被学术界誉为“范本”。

寺中的元代《普宁藏》同样意义非凡。它由杭州余杭普宁寺主持刊刻，校勘严谨，雕刻精美，是元代最具代表性的木刻大藏经。更为珍贵的是，崇善寺保存的《普宁藏》数量丰富，而且不少经卷仍保留着最初的印施题记。这些看似普通的文字，实际上记录了一部古籍辗转流传的轨迹，为我们研究古籍流布、寺院文化以及山西社会历史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。

如果说宋元刻本代表了中国雕版印刷的发展，那么明代《永乐南藏》和《永乐北藏》则体现了国家组织刊刻大藏经的最高水平。《永乐南藏》整理精良，内容丰富，版本更是复杂；而《永乐北藏》则因宫廷刻经而闻名，其字体秀美，装帧精致，是现存最精致的汉文大藏经之一。如今，崇善寺仍保存着当初的明代藏经柜，经柜上的金色编号依然清晰可辨，这些与藏经相配套的证据不仅保存了古籍，也保存了数百年来寺院管理藏经的真实场景，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藏书制度难得的实物资料。

盛世修文 故纸新生

然而，即使寺院再三妥善保存，岁月流逝也给这些珍贵古籍带来了严峻挑战。一些经卷已经出现了断裂、脆化等病害。如不及时修复，这些跨越千年的文化遗产将面临进一步损坏的风险。

本次崇善寺古籍保护修复项目，正是新时代下“盛世修文”理念的具体实践。从北宋《开宝藏》开启中国刻本大藏经时代，到崇善寺珍藏宋元明历代重要版本，再到今天古籍保护修复工程全面启动，一部部大藏经及其保存保护的历史，不仅记录着中国文化事业的一步步发展，更见证了中华民族珍视典籍、赓续文脉的文化传统。

保护修复工程修复的不仅是一页页古纸，更是中华文明延续千年的文化记忆。通过学术整理、科学保护与活化利用，这些沉睡于藏经阁中的古籍，将以新的方式走近公众，也将为学术研究、文化传播和文明传承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源。

古籍无言却承载文明，薪火相传方能生生不息。今天，当我们走进崇善寺，看到的不只是数万卷古籍，更是一部跨越千年的中华典籍文明史。正如“盛世修文”所体现的文化追求一样，保护这些珍贵典籍，保护的正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根脉，而这，也是我们这代人留给未来的一份厚重历史遗产。

从“漾”说起

郝妙海

在晋源区，经常会听到类似“把蝇拍拍给我漾过来！”“别上来了，我给你把钥匙漾下圪吧！”这样带“漾”的话。漾在晋源方言中读出来近乎“yò”，是“扔”的意思。

用“漾”来表示扔，古已有之。元孟汉卿《张孔目智勘魔合罗》剧本中的第四折，就有“漾一个瓦块儿在虚空里”的句子。《水浒全传》第八十一回中，也有“只听的墙里应声咳嗽，两边都已会意，燕青便把索来漾将过去”的描述。在现代汉语中“漾”的这种用法已几乎不见了，但在晋源方言中仍会经常听到。如果扔得不是很远，且所扔的东西既不很重，也不怕摔，对人不会有伤害时，几乎都可以用这个字。

在晋源，与“漾”一样描述扔这一动作的词，还有“mān”。“mān”的力度比“漾”要稍大些，所扔的东西也要稍重一些。比如“mān砖”“mān土坷垃”“mān石块”等。小时候我们常玩一个游戏打判官，5个孩子从远处用自己的悠儿（一块打磨成椭圆形的石片或瓮片）轮流击打已在相应位置立好的砖头，为了决定击打的顺序，5个游戏者须站在一条固定的线上向远处“mān”出自己的悠儿，“mān”得最远者即可优先击打。

在晋源方言中，还有一个字“砍”，也可表示扔的意思。不过，用“砍”表示扔的动作时，常指丢弃的是无用之物。如一家子吃完西瓜，大人会吩咐孩子：“把西瓜皮砍到门外灰渣坡上去吧！”家中杂物太多时，家中女主人往往会吩咐男人：“快拾掇拾掇，把那些没用的东西，能卖的卖了，不能卖的，趁早砍了！”“砍”在晋源方言中，很多时候和“漾”或“mān”连用，叫“漾得砍了”“mān得砍了”。连用时，漾或“mān”表示动作，砍则表示“弃”的结果。如“从小区配货站取了个快递，道儿上就把包装拆下来mān得砍了。”“这个茴子白烂了，一阵阵下楼时捎出去漾的砍了吧！”

“丢”，在晋源地区也有扔的意思。小时候，我们常玩的两个游戏，一个叫丢三慢，一个叫丢沙包。丢三慢是将三枚铜钱置于掌上，然后手一扬，将其扔到地上，然后根据落地后铜钱正面或反面朝上定输赢。丢沙包是将几个沙包轮流扔到空中，随接随扔，以沙包不落地为赢。大人带孩子出去玩，给孩子买了带皮核的水果后，会提醒孩子：“吃了后，将骨骨（核）丢到垃圾桶里，不要丢到地下！”

傅山为孙传庭喊冤

郝岳才

孙传庭，字伯雅，山西代县人，明末著名军事统帅。明崇祯十六年（1643）五月，朝廷命孙传庭兼督河南、四川军务，随后升为兵部尚书，改称督师，加督山西、湖广、贵州及江南、北军务，兵部侍郎张凤翔进言“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，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，不可轻动”，但崇祯帝不从。孙传庭在朝廷的催逼下，于八月亲率白广恩、高杰等部10万人出师潼关，同时檄左良玉西上，总兵陈永福、秦翼明分别将河南与四川兵互为掎角。九月，孙传庭在汝州（河南郏县）兵败，李自成一日内追杀四百里，直撵孟津，明军四万余人战死，损失大量兵器辎重。十月初，李自成攻克潼关，总兵白广恩、陈永福投降李自成。李自成以十万军马围攻孙传庭，孙传庭向渭南撤退，十月初三，孙传庭战死，时年51岁。然而，崇祯却认为他诈死潜逃，没有给予赠荫。

面对朝廷对孙传庭的不公，傅山先生甘冒风险，写下《孙文穆公补闻传》，为孙传庭申冤鸣屈，还原事件真相。该文未被诸版《霜红龛集》收录，也未见之于两版《傅山全书》，而是藏于定襄清末吴德光《拾遗集》中。

吴德光在《拾遗集》中自叙，数十年“随处蒐罗，沿门察访”辑成《补阙摭遗》七十三卷，清同治元年（1862）朔梦肇删定为九卷《拾遗集》。清同治三年（1864）甲子暮春，樊仲弧等若干人剞劂未果，吴德光、樊仲弧前后离世，《拾遗集》刊刻之事搁置。清光绪丙子（1876）秋，吴德光生徒与四方名士再筹金谋划付梓，并由吴德光门人侯联桂与石牧川分编增补，整修残缺，最终在太原靴巷晋愧斋刷印。侯联桂（字沱川）在其《增补拾遗集自叙》中所言：“历代诸名家虽有遗稿行世，而不免有一、二遗篇，如傅青主先生霍宣成侯一传，珍藏于故世家中，彼寒窗坐诵者，其孰能见之也！”

《孙文穆公补闻传》原文如下：

明督师尚书孙文穆公，名传庭，字百（伯）雅，山西代州人。为人沉静刚毅，多筹画，袁公继咸尝称：“其才能办贼，将兵有法，不在王阳明之下。”袁公可谓真知文穆者也。自文穆经略天下，造火车万辆，贼师不敢窥关，生民皆谓功成立马，咫尺平戎也。

谁识天王无主，以听奸臣之言，诏下，促师出关，复遇大雨，七日夜不止，粮车不济，以致士马多饥奔窜四方。官军败，文穆与参军乔迁高斩贼将十余人。贼伤文穆马，文穆被执，自成跪请降，文穆脚踏成颡，皮裂，成怒，命壮士解文穆肉以分赐群丑食之，将骨挫为力柄。参军又手刃数贼，知力不支，曰：“帅已亡，我独何存！”遂跃马大呼曰：“我监军道乔某也！”自刎颈而死。

文穆与参军，其忠烈如此，而世之好事恃才者竟以文穆从和倘与大足婆隐去，其言不亦谬乎！或曰文穆既非隐去，而尸骸无存，所存者独参军尸骸耶？余曰，文穆肉被群丑分食，骨挫刀柄，其尸骸岂能得乎？余读传，至“传庭死，关内无坚城”之句，不觉泪流涕下，故援笔而补余所闻尽节之事。以公论之，孙公应当得谥，余遂私谥曰“文穆”。

野史氏曰：“昔武侯出师未捷而身死，论者以为天命。”今文穆出师未捷而殉难，由促之出关，复遇大雨，虽曰人事，其非天命哉？

呜呼！文穆之忠烈极矣！然犹不免有偷生惜死之议。嗟乎！天乎！云何天耶人耶？傅子不能不为世白也。

《明史》如此论及孙传庭：“传庭死而明亡矣”。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，清廷为孙传庭追谥“忠靖”。

明初，孙传庭始祖孙成以从戎迁雁门，隶振武尺籍。四传而生孙岐，岐举孝廉，任莒州守。岐生孙宗派，宗派举嘉靖甲午孝廉。宗派生孙汾秀，读书不第。汾秀生嗣约，官观城。嗣约生孙元震，元震即孙传庭生父。孙传庭六岁读私塾，颖异绝伦；十三岁出应童子试，辄冠其军，与诸生大小数十试，均列前茅。以万历戊午己未联第成进士。出仕后不久，心念独子奉孀母，遂请假归里数年。孀母已年迈，一子仅周岁。自明天启五年（1625）至明崇祯八年至十年（1635-1637）间，大治第宅，辟园圃，穿溪叠石，种松栽荷。朱楼画舫，花晨月夕。奉侍老母间闭户危坐，焚香读书。亦招待宾客，酌酒选奕，赋诗谈笑，萧鼓之声无虚日。里中有七八人从其谈性命、经济及举子业。一家人其乐融融，怡然自得。明崇祯八年（1635）秋，流民纷纷揭竿而起。孙传庭应召，后于明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升任兵部尚书，统领七省军务，先后参与并主持了数十次对明末民军的镇压活动，一直到明崇祯十六年（1643）于潼关战死。战死潼关后的第五天，西安失陷。继妻张淑人守“丈夫报国”家训，率二女三妾投井，仅八岁次子孙世宁跳墙逃入民舍，被一老翁收养。长子孙世瑞弱冠年龄，远在代州老家，听闻父亲死讯后，日夜奔波往陕西，从井中找到张氏尸体并埋葬，从老翁家中接出死里逃生的孙世宁，兄弟二人相扶而还。延续孙家血脉，传承孙氏家风。

从明崇祯十六年（1643）孙传庭惨死，到清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清廷为孙传庭追封“忠靖”谥号，整整经过了133年。而傅山先生《孙文穆公补闻传》则早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即已成文，尽管藏之于民间，却是珍贵的史实。

晋阳饭庄是北京市最早经营山西风味菜肴的饭店，店内的香酥鸭在1989年被国家商业局（现国家商务部）授予“饮食业优质产品金鼎奖”。上世纪80年代，原国营南郊人民饭店经理杨纯业到北京晋阳饭庄进修，回到太原后，他结合晋阳饭庄香酥鸭特色对太原传统焖炉烧鸭加以改良，并正式取名“南郊香酥鸭”。

不同于北京烤鸭的脂香张扬，也不像广式烧鸭的甜润婉转，南郊香酥鸭带着黄土高原的质朴与刚烈，诠释着属于并州的饮食智慧。

清晨，晋祠五府营村的鸭棚里，本地麻鸭扑棱着翅膀。麻鸭每日在汾河滩涂自由觅食，皮下脂肪层仅薄薄一层，肉质紧实中带着山野气息。这份天然的野性，正是南郊香酥鸭风味的根基。

香酥鸭的烹饪过程堪称一场与时间的博

弈。褪去鸭毛后，并不急于下刀，而是将整鸭悬挂在通风处，让干燥的风慢慢收紧表皮。这种独特的“风干术”，与北京烤鸭吹气分离皮肉、广式烧鸭上皮水的技法截然不同，全凭自然之力让鸭皮脱水收缩。腌制时，本地特色的香料组合和手法堪称神来之笔，既巧妙中和鸭肉的腥气，又能在舌尖掀起微妙震颤。

不同于烤鸭的明火炙烤、烧鸭的炉中焖焗，南郊香酥鸭选择蒸制后在滚烫的油锅里“涅槃重生”。油温需精准控制在180℃，鸭子下锅后，师傅手持长柄铁勺不断浇淋热油，让鸭皮在油浪中炸裂出细密的脆纹。这是一场对耐心的考验，既不能让油温过高烧焦表皮，又要保证皮下脂肪充分融化。当鸭子在七成热的油中完成二次复炸，出锅时的模样令人屏息——焦糖色的表皮泛着琥珀光泽，轻轻一戳便发出清脆的裂响。

南郊香酥鸭讲究“整吃”的豪迈。食客撕下带着脆皮的鸭腿，油脂与肉汁瞬间在齿间迸发，酥脆的表皮与鲜嫩的肉质形成奇妙的口感交响。搭配的蘸料分为两种：其一与烤鸭如出一辙，干黄酱、甜面酱、白糖灵魂调味，搭配葱丝、黄瓜丝；其二则是在老陈醋里调入蒜泥、姜末，再撒上一把焙香的白芝麻，酸、香、酥、油相互激荡，将鸭肉的本味衬托得愈发醇厚。这种直来直往的味觉冲击，恰似太原人豪爽大气的性格写照。